

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  
敦煌藏学研究丛书

#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王 尧 陈 践 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  
敦煌藏学研究丛书

#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王 羯 陈 践 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 王尧, 陈践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5325-4769-2

I. 敦… II. ①王… ②陈… III. 敦煌学 - 藏语 - 文献 - 研究 - 文集 IV. K870.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1791 号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王 尧 陈 践 译 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l@guji.com.cn](mailto:guj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9.5 插页 6 字数 500,000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978-7-5325-4769-2

K·1022 定价: 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62662100

## 三 版 前 言

顾炎武(亭林先生)论著书之道,说:“必前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这也道出我从事敦煌本吐蕃文书译注工作的心情。

先师于道泉教授(1901—1992)在欧洲留学、工作十五六年,深知敦煌藏文卷子之重要,要我下决心研究。谆谆教导、心长语重,不敢或忘。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先后将 P. T. 1288 大事纪年、P. T. 1287(2)贊普世系、P. T. 1286(1)小邦家臣及大相统序,陆陆续续搞出一个稿本。先在青海民族学院王青山和李延凯二同志的帮助下,将藏、汉文分别印成小册子在同行中传观、征求意见。后,代表极“左”思潮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大地重光,人们的满腔热情关注学术研究的新发展。又与陈践同志合作,北京民族出版社在 1980 年正式排印公开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译注》。当时,请闻宥教授(1901—1985)用他那苍古遒劲的书法题写了书名。一次印了 3 000 册,很快销售一空。1992 年又印了一次增订本,16 开装,现在也难找到了。

可以看出这项吐蕃史研究的工作正是史学界、民族学界、藏学界普遍关注的事实。

现在,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合作,整理出版流失英、法的敦煌古藏文文献。于是,流落在巴黎和伦敦已经百年的敦煌藏文写卷得以全部呈现在研究者眼前。

敦煌藏文写卷公开出版发行后,人们研究敦煌吐蕃文书再不用到海外去奔波劳碌,在自己的书斋里、图书馆里,就可以细心地琢磨、探索了。可以相信,今后将会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出现,对吐蕃史、对藏族史乃至对民族史都会做出重大贡献。如今的学术环境,正是古人所说的“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真正是到了“风正一帆悬”的境界了。

2006 年 11 月

王尧 于中央民族大学寓所

# 再 版 前 言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译注》，它的价值毋庸赘言。我们根据巴考(J. Bacot)1940年出版的译注本重行释译，工作近二十年，中间几度油印成册，内部流通，直到1980年得到民族出版社的协助，才得以公开出版。此后仅一年有余，出版社就通知我们：初版3 000册全部售完，拟再版。这使我们深为感动。不是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惊人之处，而是这本书对于研究者太重要了，不管是研究藏族历史、文学、语言、宗教、法律、文化……哪个方面都离不开古代史料，而本书所包含的内容恰恰能满足这个要求。我们的工作很不够，有不少地方需要改动。特别是，我们受到法国老藏学家石泰安(R. A. Stein)教授以及布隆多夫人(Mrs. A. M. Blondeau)、斯巴尼安女士(Ms. Spanian)的帮助，读到巴黎出版的影印本《敦煌本藏文文献选集》，得以将其中的P. T. 1286、1287、1288和I. O. 750、B. M. 8212(187)诸号与巴考先生的拉丁文转写本彻底核校，当中，我俩先后获得去巴黎翻阅原卷的机会，目验手披，逐字对读，发现我们出版的本子所根据的拉丁文转写本有若干阙漏、伪误和脱失，均将其一一订正。如：卷首一段文字，巴考书中全脱，这次将它补出。此外收藏在伦敦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卷子也有缘到英伦去校读，订正。

另外，必须敬告读者，出版译注中有若干舛错，在此作了纠正。

如： རྒྱତྚ ། 一词，我们按照字典一律解释为“泥婆罗”，以作地名，显然与吐蕃历史事实不符。今居日本老藏学家佐藤长先生的释译，改正为“跋布川”。这样，既符合汉籍《通典》和《新唐书·吐蕃传》，又能切近藏文古音，所以，凡在吐蕃境内的 རྒྱତྚ 都作了改正。又如： རྩୟ རྩୟ རྩୟ རྩୟ རྩୟ(ྩୟ) | ພୟ ພୟ 等等重要语词的释读，在乌瑞、张琨、李方桂诸教授论著的指引下，根据我们教学工作的进展及青年同志的建议，一一作了改译，请读者再作指正。为了阅读和使用的方便，我们把全书作了技术上的调整，即：原文、藏文注、拉丁转写、汉译文及注译、附录等几个部分，目的是让更多的同志能对照着汉藏文审读。我们的工作不敢说已经十全十美了，只能说，它可以反映目前的研究水平。

在这里，我们向民族出版社藏文编辑室的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他们同意再版我们的增

订本,使我们有机会改正自己的错误,以免“谬种流传,贻误后世”。

亡友马雍教授生前对本书甚为关注,并以资料相赠,令我们感念不已。好友噶尔美·桑木旦坚参和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奥开费先生一贯帮助我们,十分感谢。还应提到褚俊杰同志付出辛勤劳动,为本书增订操劳,在此一并致谢。

笔 者

1989年8月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

# 导　　言

## —

从 1899 年敦煌石室藏经洞的遗书被发现算起, 到今年整整八十周年了。这八十年中, “敦煌遗书”的整理和研究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 影响所及, 靡远不届。它给文化典籍、史学、考古、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民族、宗教乃至科学史等各个学科提供了丰富的、新颖的、可信的真实文献和实证资料, 扩大和推进了这些学科的研究工作的展开。因而它使人们对于我国中古时期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和中西交通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于是海内外学者翕然相从, 蔚成风气。“敦煌学”, 这一崭新的学科便应运而生<sup>①</sup>。

就我们国内而言, 已故的向达、王重民、陈垣、刘复、周叔迦诸先生以及健在的姜亮夫、唐长孺、谢稚柳、常书鸿诸先生对此学或则辑录遗篇, 或则考证钩沉, 探幽阐微, 博征广引, 至今为后学所景仰。尤其是 1959 年顷, 值“敦煌遗书”问世六十周年之际, 我国编辑出版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使人们对敦煌文献有了清晰的了解, 可以“按目索卷”, 登堂入室, 为研究工作的推进提供了方便条件。<sup>②</sup>

## 二

我们知道, 敦煌遗书中除大量的汉文文献外, 还有若干民族文字, 诸如婆罗谜文、佉卢文、回纥文和西藏文的卷帙。其中又以西藏文文献占比重最大, 材料最多, 内容极为丰富。这批藏文文献都是吐蕃时期的遗物。

吐蕃时期是我国藏族历史上一段至为重要的时期。当时, 奴隶制社会完全形成, 吐蕃奴隶主军事部落联盟组成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地方政权, 在政治制度、经济设施、军事组织、生产机构和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是藏族人民在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进程中作出的重大贡献。研究这一段历史, 对于维持祖国的统一, 增进兄弟民族的团结, 提高民族

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极有补益。

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献大致包括三类:一、金石铭刻;这一大类包括吐蕃王朝官方为会盟、纪功、述德、祭祀、颁赏、封赠的需要而树立的石碑(石柱),以及铸造的铜钟,上面均有古藏文刻辞。细目如下表:

编号	名 称	内 容	时 间	地 点
1	唐蕃会盟碑	会盟	823 年	拉萨大昭寺前
2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纪功	764 年(?)	拉萨布达拉宫前
3	第穆萨摩崖刻石	颁赏	798—815 年之间	林芝广久
4	谐拉康碑 甲	述德	798—812 年之间	墨竹工卡北
5	谐拉康碑 乙	述德	812 年	墨竹工卡北
6	谐拉康刻石	祭祀	798—815 年之间	墨竹工卡北
7	赤德松赞墓碑	述德	815—838 年之间	山南琼结
8	噶迥建寺碑	封授、立盟	798—815 年之间	若玛岗
9	桑耶寺兴佛证盟碑	封授、立盟	779 年	扎囊桑耶寺
10	楚布江浦建寺碑	祭祀、证盟	815—835 年之间	堆龙楚布寺
11	丽江吐蕃藏文碑	记南诏与吐蕃关系	755—797 年之间	云南丽江
12	玉树摩崖石刻	记佛像塑造事	798—815 年之间	青海玉树
13	丹玛摩崖石刻	记佛像及佛经	804 年	昌都察雅
14	普兰观音碑	记观音像事	815—836 年之间	阿里普兰
15	堆龙热寺碑	热译师生平	842 年后	西藏堆龙
16	桑耶寺钟铭	祭祀	779 年	扎囊桑耶寺
17	昌珠寺钟铭	祭祀	798—815 年之间	乃东昌珠寺
18	叶尔巴寺钟铭	祭祀	779 年后(?)	拉萨东郊扎叶尔巴

二、竹木简牍:绝大部分在新疆南部和东部出土,在甘肃省境内也有发现,藏语称之为“khram”。公元 670 年以后,吐蕃军旅长期驻扎南疆至河西走廊一线,进行屯戍。由于自然地貌的变迁,婼羌、且末直至于阗,有不少吐蕃古堡被流沙淹没。本世纪初,一批外国探险家就曾在南疆盗掘出若干吐蕃木牍。1959 年、1973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婼羌

的米兰古堡进行科学发掘,发现一大批木牍。这些木牍上的藏文具有吐蕃时期的特征,引起国内外藏学界的广泛注意。<sup>③</sup>

三、敦煌石室的藏文手卷。就是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敦煌石室遗书的藏文部分。它于1907—1908年间被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盗运国外,分别庋藏于英法两国。在英国的部分,藏于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比利时人威利布散(Vallee Poussin)在旅居英伦期间把它编成目录,这个目录到1962年才得以出版。名为:《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古藏文写本目录——附:榎一雄:汉文目录》(*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with an appendix on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by Kazuo Enoki*)在法国的那一部分,由拉鲁女士编成三本目录,分别在1939年、1950年、1961年出版。原件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目录名称是:《巴黎国家图书馆入藏伯希和搜集的敦煌文写本清册》,第一册,1—849号,第二册,850—1282号,第三册,1283—2216号。(M. Lalou: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éque National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Paris.* I. 1939, II. 1950, III. 1961。)英、法两处加在一起约有五千卷左右。

### 三

这里介绍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或称为《吐蕃历史文书》)原是一个完整的卷子,被人为地分裂为两件。藏于巴黎图书馆的,原登录号为252。藏于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原登录号为S. 103. (19VIII. 1)合起来全长4.34米(巴黎部分长0.70米,伦敦部分长3.64米),宽0.258米。按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一、吐蕃大事纪年:起自狗年,即唐高宗永徽元年,庚戌,公元650年;终于猪年,即玄宗天宝六年,丁亥,公元747年。合计九十八年。下面又根据伦敦所藏原登录号8212(187)的卷子补充,起自猴年即玄宗天宝二年,甲申,公元744年之上一年(因年代残阙,应是羊年,即天宝元年癸未),终于兔年(代宗广德元年,癸卯,公元763年)之下一年。(也因年代处残破,应为代宗广德二年,甲辰,764年。)共补充出21年。其中又有四年重出,实际总数为115年。这一百多年中吐蕃一侧记载的重大事件悉备于中。

二、吐蕃赞普传记,并包括历任大论的位序,共十节,举凡会盟、征战、颁赏、联姻一类大事均有记载,还记录了民间的传说、神话、古代歌谣等口头创作,完全保留了古人的风貌,是十分可信的文学作品。

三、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这一份材料经法国巴黎大学藏文教授巴考(J. Bacot)、

杜散(Ch. Toussant)和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托玛斯(F. W. Thomas)三人通力合作,锐意钻研,中间曾得到藏族学者、《丁香帐》(li-shi-gur-khang)一书的重编者噶钦顿珠(ka-chen-don-grub)先生的帮助,前前后后有十五年之久,1940年在巴黎出版了名为《敦煌历史文书》(*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a l'histoire Dur Tibet*, Paris 1940)一书。此书虽然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如火如荼年代,仍然引起学术界极大的重视。当时,就有人说过,此书一出,西藏史的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至今已三十余年过去,人们还认为它是研究藏族古代史、古代语言和古代社会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于道泉教授在1948年回国时,将此件带回国内。原来他在巴黎大学曾从巴考学过藏文,久有志钻研吐蕃文献,解决我国兄弟民族的历史问题。但回国后,课务繁忙,他的兴趣又有所转移,乃将这份材料交我们,谆谆嘱托,令人感动。中间又经过二十寒暑,几作几辍,时废时兴,终于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在周围同好的赞助下,使这份古藏文历史文书,以藏汉文对照面目,和读者见面了。

这份历史文书,是藏人记录藏事的第一手材料,它的权威性,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纠谬:唐人记载吐蕃史事很勤,是研究吐蕃史的重要资料。但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所记史实中也有很多舛误、遗漏和欠准确的地方。另外,两《唐书》、《册府元龟》、《通鉴》、《会要》之间,也经常有抵触矛盾之处,《吐蕃历史文书》在这些方面可以起澄清纠谬作用。如:

《通鉴》二〇二《唐纪》十八:“调露元年(己卯,679年)二月,壬戌,吐蕃赞普卒,子器弩悉弄立,生八年矣。”《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外臣部·和亲》二:“调露二年,十月,吐蕃文成公主遣大臣论塞调旁来告丧,并请和亲,帝不许之。遣郎将宋令文往吐蕃会赞普之葬。”

看来,应该是赞普卒于调露元年(679年)二月,而告丧则在次年的十月。可是在《册府元龟》的另一段记载中却又含糊起来:《册府元龟》六六二《奉使部·便宜》:“裴行俭为吏部侍郎,仪凤中,高宗闻吐蕃赞普卒,而嗣未立,诏行俭为抚使乘间经略之。行俭以赞普新立,复委政于钦陵,未有间隙,乃止。”这里只说“仪凤中”,不提具体年代,叫人犯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打开这份古藏文历史文书,第二十七节写着:“及至鼠年(仪凤元年,丙子、公元676年)夏,赞普驻于‘札’之鹿苑。冬,赞普墀芒伦薨于‘仓邦那’。赞普子墀都松(即器弩悉弄)诞生于‘折’之‘拉拢’。”这一记载说明,赞普死于676年。接着,第二年又记年载:“及至牛年(仪凤二年,丁丑,公元677年)赞普父王之遗体隐匿于‘巴拉木’。”再一年,又记载:“及至虎年(仪凤三年,戊寅,公元678年),赞普父王遗骸隐匿不报,厝于‘巴拉本’。……冬,为父王发丧。”再下一年的记载:“及至兔年(调露元年,己卯,公元679年),赞普驻于辗噶尔。于‘琼瓦’为父王赞普举行葬礼。”

这样,我们可以弄清楚,赞普芒伦确实死于仪凤元年(676年)。由于赞普新故,嗣君刚

立,政局不稳等政治上的需要,匿丧不报,直至第三年(678年)冬才公开发丧。第四年(679年),才将遗体运至故都琼瓦,公开举行葬礼。唐朝官方当初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只能将公开举行葬礼的时间记为薨逝的时间。后来宋令文到了吐蕃参加会葬典礼,大致了解到实情,又不便于明载,所以就支吾其词,作“仪凤中”了事。又如:

《通鉴》二〇九《唐纪》二十五“中宗景龙三年,九月乙亥,吐蕃赞普遣其大臣尚赞咄等千余人迎金城公主”下,胡注:“咄,当没翻,《考异》曰:实录:乙亥,吐蕃大臣尚赞咄等来迎女。《文馆记》云:吐蕃使其大首领瑟瑟,告身赞咄金,告身钦藏以下来迎金城公主。译者云,赞咄,犹此右仆射,钦藏,犹此侍中。”

在“文书”第六十一节则记载:“及至狗年(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派员准备赞蒙公主来蕃之物事,以尚赞咄热拉金为迎婚使。赞蒙金城公主至逻些之鹿苑。”尚赞咄热拉金即尚赞咄,是人名,并非官职,所谓赞咄,犹此右仆射云云,是出于译者的讹传。

“文书”第一一二节记载:“……对大尚论予以褒奖,授大论囊热以白宝石文字告身,任为大论,尚·野息授以瑜石(瑟瑟)文字告身,并提拔至与噶尔致门相应同等之权位。论·绮力卜藏任为大论;东赞授以瑜石(瑟瑟)文字告身,并授以四境防戍都元帅之诏令……”可见瑟瑟告身、金告身是吐蕃施行的告身制度,正如两《唐书·吐蕃传》所记:其官之章饰:最上瑟瑟,金次之,金涂银又次之,银又次之,最下至铜止,差大小缀臂前,以辨贵贱。《册府元龟》亦记“……章饰有五等:一谓瑟瑟,二谓金,三谓金饰银上,四谓银,五谓熟铜,各以方圆三寸褐上装之。安膊前以别贵贱。”其实在《册府元龟》九六一《外臣部·土风》三,明明白白记载:吐蕃国……爵位则以宝珠,大瑟瑟、小瑟瑟、大银、小银、大瑜石、小瑜石、大铜、小铜等为告身,以别高下。而藏文史书《贤者喜宴》ja卷第十八页所记云:“告身共六种,各分大小、为十二级。最上为玉(即瑟瑟)、金,次为银、颇罗弥,又次为铜、铁。”这正合唐代制度。唐制:奏授补判之官,皆给以符;谓之告身,后世之奖札功牌亦曰告身。吐蕃所行即唐制之流风。《通鉴》标点者不察,竟点出“大首领瑟瑟”,“告身赞咄金”,“告身尚钦藏”之类来。

再如:两《唐书·吐蕃传》都记“其吏治无文字,结绳凿木为约。”这一条记载,无疑是不准确的。这一份“文书”本身就是有力的明证。都可纠正汉文文献中的谬传。

## 二、补阙:

《册府元龟》九六二《外臣·官号》:“吐蕃号其王为赞普,置大论、小论以统理国事,虽有官,不常阙职,临时统领。”

这一段话对吐蕃官属的情况颇多误解。根据《历史文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吐蕃论、尚一级的官员,每年夏、冬二季要主持集会议盟,要征收贡赋,要料集兵丁粮草,要写定法律条文,要清查户口,要东征西讨,诸如对吐谷浑之战争,对羊同苏毗之经略,对南诏之抚服,对于阗等安西四镇的侵扰,几乎是走马灯一样,忙碌得很,并不是“不常阙职,临时统领”;否则,这么

繁重的任务是没法完成的。汉文文献的记载缺漏甚多,从《历史文书》上可以得到补足。

又如:《册府元龟》九五八《外臣部·国邑》二:“悉立国,在吐蕃西南,户五万余,有城邑村落,依溪涧。”《外臣部·土风》六又记载:“悉立国在吐蕃西南。户五万,胜兵五万人(这句话可能有错误,似乎不可能有那么多兵),其地有城邑村落,咸依溪涧。男人以缯彩缠头,衣毡褐,妇人以辫发,著短褐。婚姻简略,不行财覩,以蒸报为俗。畜多水牛、羖羊,鸡,豕;谷宜梗稻、麦、豆;饶甘蔗诸果。死者葬于中野,不封不树,丧制以黑为衣,一年就吉。刑有劓劓。羈事吐蕃,自古未通中国(原注:贞观二十年遣使献方物)。”

关于“悉立”这个小王国的记载,从汉文文献中描写的方位、气候、物产,特别是“甘蔗”、“梗稻”、“水牛”等等,都具有亚热带的特点,并且是“依溪涧”,在“吐蕃之西南”,应该是“亚东”(gro-mo)一带喜玛拉雅山谷地。而《历史文书》中十七节(666年)二十节(669年)、二十五节(674年)、三十二节(681年),多次记载此小王国,普赞也曾巡临、常驻。足可补充。

### 三、印证:以《历史文书》材料来印证汉文史料。如:

禄东赞一家父子专吐蕃国政数十年,赞普嫉恨,酝酿政变一事,《新唐书·吐蕃传》记载:钦陵专国久,常居中制事,诸子皆领方面兵,而赞婆专东境几三十年,为边患。兄弟皆才略沈雄,众惮之。器弩悉弄既长,欲自得国,渐不平,乃与大臣论岩等图去之。钦陵方提兵居外,赞普托言猎,即勒兵执其亲党二千余人杀之。发使者召钦陵、赞婆,钦陵不受命,赞普自讨之。未战,钦陵兵溃,乃自杀,左右殉而死者百余人。

这件事,《历史文书》中有反映:“乃至狗年(中宗嗣圣十五年,太后圣历年,戊戌,公元698年),夏,赞普巡临北方,大论钦陵引兵赴大小宗喀,执唐军元帅都护使。其年冬,噶尔家族获罪。”与《通鉴》二〇六所记相符。第二年又记:“及至猪年(699年),清查获罪家族之财产”,所以赞婆及莽布支等人率骑投唐。《册府元龟》九七四《外臣部·褒异》一:“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十月,吐蕃首领赞婆至,遣羽林飞骑郊外迎之。庚戌,宴赞婆于武威殿,极欢而罢。”《新唐书·吐蕃传》记着:“赞婆以所部及兄子莽布支等款塞,遣羽林飞骑迎劳,擢赞婆特进辅国大将军归德郡王,莽布支左羽林大将军安国公,皆赐铁券,礼慰良厚。赞婆即领部兵戍河源,死,赠安西大都护。”

此事又见于《历史文书》的(传记篇)第九节,其中叙述噶尔家族与赞普王室之矛盾激化,器弩悉弄赞普引吭高歌之歌词中有:“在‘葭布’的一个小山谷里,一个平民想当王哩!虾蟆想上天哩!噶尔想当王哩!”可以印证汉文史料之精确。

再如:萧嵩纵计反间,吐蕃杀其大将悉诺逻恭禄一事,在两《唐书·吐蕃传》、《萧嵩传》中均有记载。此事对于一段时间河西地区政治形势颇有关系。如《旧唐书·吐蕃传》云:“时悉诺逻恭禄威名甚振,萧嵩用纵反间于吐蕃,云其与中国潜通,赞普遂召而诛之。”这在唐廷来说本是一件得意的事,在《历史文书》七十七节有:“及至虎年(玄宗开元十四年,丙寅,726

年),多思麻之冬季大会由悉诺逻恭禄于则南木夭地方集会议盟”。第二年:“及至兔年(727年),任命外甥吐谷浑小王、尚·本登葱、韦·悉诺逻恭禄三人为大论。”可见还是比较倚重的权臣。但是到了下一年:“及至龙年(728年),赞普驻于札玛牙帐,韦·悉诺逻恭禄获罪谴”。在吐蕃文书中,“获罪谴”是杀头、抄没的同义语,不过说得文明一点而已。反间事从这里得到进一步证实。

其他诸如汉文史书中记功的尚赞咄、尚钦藏、仲琮、名悉腊、论岩、尚绮立心儿、尚乞力徐、尚结赞等等吐蕃名臣,都能在《历史文书》中找到相应的印证。不再一一列举。

最后,必须声明,我们对史学纯属外行,不过是利用点语言知识来为吐蕃研究提供一点信实的史料而已。翻译和考释中的问题定然不少,希望读者予以纠正。在这份材料行将刊布之时,对于道泉教授、东噶·洛桑赤列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帮助,几乎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

---

注释:

① 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出版了一种叫做《敦煌学》的专门刊物,刊布研究敦煌文献的专著,在西方学术界里,“Tun-huangology”(敦煌学)一词已经在使用。

②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年,商务印书馆编印。包括汉文及部分民族文字共两万二千五百卷的目录。其中有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卷,斯坦因劫走的七千卷,伯希和劫走的二千五百卷,散在各处的三千多卷。共四录、一索引、一附录,“对于敦煌遗书的著录(汉文部分)大致无遗”。

③ 关于简牍材料已见公布的有:托马斯《关于新疆的藏文文献集》I (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ing Chinese Turkestan II, 1951) 文中有木牍三百余支的材料。苏联《东方碑铭学》及伏斯契可夫《藏文历史文献》中均有简牍材料公布;R. C. 伏罗别夫——恰多夫斯基,曾连续发表三篇吐蕃木简考释,共六支,原件藏苏联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北京。该书第七〇页即吐蕃木牍样张。《文物》1960年八、九合刊,有发掘中获得藏文木牍二二五支的报导,并附有照片,文中所谓“古民族文字”云云,即藏文。

Հ Ա Յ Ի Շ Ո Ւ Ղ

ସମ୍ବନ୍ଧିତ ପରିଚୟ

ମୁଦ୍ରଣ 1979 ପତ୍ରିକା 10 ପରିଚେତନା

לְאַמְתָּה נִשְׁתַּחֲוֵד הַנֶּגֶב שֶׁבְּאַמְתָּה

ଶ୍ରୀପଦେଶବିହୀନକାଳୀନରୁ ଏହାରୁ ପରିମାଣ କରିବାରେ ଅଧିକ ପରିମାଣ ପାଇଲା ଏହାରୁ ପରିମାଣ କରିବାରେ ଅଧିକ ପରିମାଣ ପାଇଲା

ଓহুশ নুর দশ বৰ্ষ অধুনা কৰ্ত্তব্য কৃষি পক্ষে সকলীয় জাগৰণ সমূহ দিশ দৰ্দিত হৈছে। কৃষি পক্ষে একটা বৰ্ণনা কৰিব আবশ্যিক। কৃষি পক্ষে একটা বৰ্ণনা কৰিব আবশ্যিক।

સુરત-શાહી પ્રદીપકાળ 1989

સ્ક્રિંચ 8 એન્ટેલેક્શન દર્શાવું

— १ —